

## 超越零和角度：重新剖析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 一、緒言

「身份認同」近年愈來愈受注視，可惜不少討論都跌入了「二分法」的思路。香港各界在談及「身份認同」時經常會引用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結果，並從受訪者認同

---

<sup>1</sup> 香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CSHK) 成立於 2017 年 6 月，是一個開放和跨科學的研究平台，旨在促進及增強香港學術界、工業界和專業服務界；社會及政府；以及香港與不同區域之間，在現實可持續發展問題上的協作，並進行有影響力的應用研究。中心總監為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李芝蘭教授。本中心於 2017 年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策略性公共政策研究計劃 (SPPR) 撥款研究「香港專業服務與一帶一路：推進可持續發展的創新能動性」(編號: S2016.A1.009.16S)。更多有關資訊，請瀏覽香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的網頁：[www.cityu.edu.hk/cshk](http://www.cityu.edu.hk/cshk)。歡迎提供意見，請電郵至：[sushkhub@cityu.edu.hk](mailto:sushkhub@cityu.edu.hk)。

<sup>2</sup> 此政策意見書內容主要源自石磊、李芝蘭、蔣義紅的學術研究成果: H. Christoph Steinhardt, Linda Chelan Li & Yihong Jiang (2017), 'The Identity Shift in Hong Kong since 1997: Measurement and Explan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https://doi.org/10.1080/10670564.2018.1389030>.

<sup>3</sup>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香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總監。

<sup>4</sup> (H. Christoph Steinhardt)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副教授。

<sup>5</sup>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副研究員、香港持續發展研究樞紐成員。

自己是「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或「中國人」的比例分佈及趨勢推論，這種「零和」的解讀導致嚴重的誤判，即當調查指出受訪者認同為「中國人」的比例下跌時，社會輿論往往會簡單歸因為香港人「缺乏國家觀念」或「地方意識抬頭」。在這個結論下要增強香港人的「中國人」(或「國家」)的身份認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透過去本土化或增強國民教育等方式來應付，但從過去幾年的經驗看，實施的結果往往適得其反。

我們進一步分析了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民調數據，顯示出「中國人」與「香港人」兩個身份認同其實並不相悖。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在身份認同的調查中有兩條問題分別要求受訪者對「香港人」(Hong Kong citizen)以及「中國人」(Chinese citizen)兩個身份作獨立評估，結果顯示自 1997 年回歸開始至 2017 年間，「香港人」這個身份的認同度一直沒有大的改變(即使 2014 年佔中運動發生後也是如此)，而「中國人」這個身份在回歸之初也有相當的認同度，並且逐年慢慢增長至 2008 年達到高峰。由此觀之，「香港人」與「中國人」這雙重身份在很長一段時間是同時獲得認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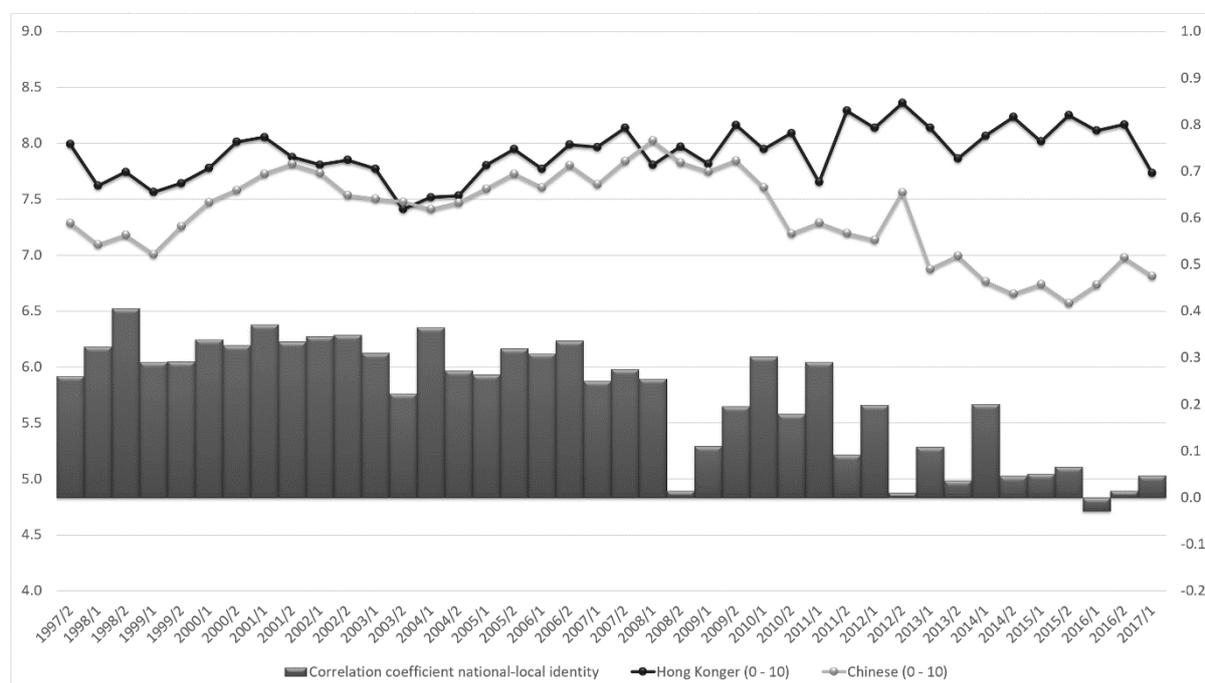
那到底是甚麼原因導致情況在 2008 年出現變化呢？我們再從港大民研數據中，整理對比了港人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以及對中央政府的信心走勢，顯示出兩者具有高度關連。我們認為，一國兩制的設計原本就是希望維持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對辯證關係，經再剖析後的港大民調數據也支持了這個觀點：對「香港人」(或謂之本土)身份的高度認同，並不是導致「中國人」身份認同度下跌的原因。因此當中央政府及香港政府在制訂相關政策以處理身份認同時宜更加謹慎對焦，這樣才能真正促進「民心回歸」。

## 二、「國家」認同跌非因「地方抬頭」

我們在這裏採用了近年被普遍討論的港大民研計劃的數字，重新分析了 1997 年至 2017 年受訪者對「香港人」以及「中國人」兩項身份認同度的獨立評估(0 為最不認同; 10 為最認同)，結果如圖 1 所示，受訪者對「香港人」這個身份的認同度在這二十年來並沒有顯著的波動變化，一直維持在 8 點水平附近，即使在 2014 年佔領中環、所

謂的「城邦派」以及「本土派」崛起後也是如此。從這個結果解讀的話，香港人從來都很「地方」，近年所謂「地方主義抬頭」之說似乎有點言過其實。在過去 20 年出現較大幅變化的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度，從 1999 年上半年的平均值 7 點慢慢爬升至 2008 年上半年 8 點以上的峰值，但在其後至 2013 年中，「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度反覆輾轉回落至 6.9 點，跌幅達 17%。而在往後 4 年，這個數值便一直於低位徘徊，2015 年中為 6.6 點; 2017 年中為 6.8 點。

圖 1：1997 - 2017 年香港政治身份的變化



注：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數據。當有多於一次調查數據時，便會採用半年平均值計算。左邊的軸顯示了「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度。右軸顯示兩個身份之間的相關系數（-1 到 1; 正數為正相關、負數為負相關）。這個分析沒有作加權處理，因此與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網站的數字會有輕微出入。

如果「地方」和「國家」的身份是互相排斥，那麼「中國人」以及「香港人」的身認同度應該展現出負相關。但結果恰恰相反，圖中柱狀圖代表了相關系數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直到 2008 年前半年「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認同度都是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正相關水平(多數處於+0.3 或以上)。兩者的正相關度其後雖然回落，但只曾在 2016 年試過一次表現出輕微的負相關度。這再一次印證了學術文獻中

歐洲長期研究的結果，即「國家」和「地方」兩國身份的認同度並非一種此消彼長的零和關係。因此，當我們在談及身份認同時應力求避免簡單地使用單項分類指標，只允許受訪者從一條問題中回答自己為「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或「中國人」的選項，如果用這種回答的結果來衡量的話，便等如假定了這些選項之間是「零和」的，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按照我們分析的結果，由於「香港人」的認同度與「中國人」的認同度之間並沒「負相關」，故此假如刻意地實施「去本土化」政策，可能只是會影響港人對香港的歸屬感，而不會令「國家」身份的認同度提高。

### 三、「信任」牽動「國家」認同

要討論「中國人」身份認同度下跌，我們從學術界以及社會公眾討論中歸納出 3 個視角：1) 從社會結構角度，分析不同階級，教育和年齡段對國家認同的分別；2) 從民生角度解釋，民眾對現實生活狀況不滿而找遷怒對象，3) 對國家 (中央政府) 的信任影響了歸屬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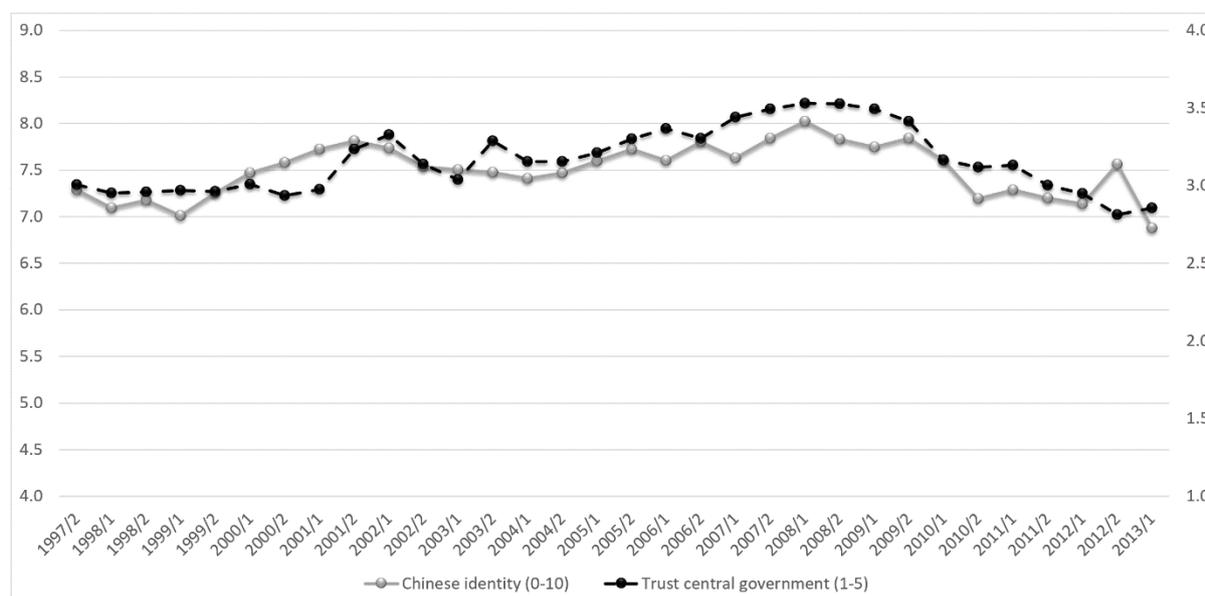


圖 2：1997 - 2013 年中央政府的信任

注：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數據。當有多於一次調查數據時，便會採用半年平均值計算。左邊的軸顯示了「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度；右軸顯示中央政府的信任（1至5）。

我們發現第三個視角，即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是對國家身份認同的最大驅動因素<sup>6</sup>。在圖 2 中我們揉合了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由 1997 年至 2013 年間受訪者對於中央的信任程度（1 為最低；5 為最高）以及「中國人」身份認同度（0 為最不認同；10 為最認同）的走勢。結果發現兩者非常同步，同「中國人」身份認同一樣，政治信任也從 1997 年的 2.81 逐漸增加到 2008 年上半年的 3.53 的峰值，隨後慢慢回落至 2.81。我們還發現，對中央的信任程度與國家身份認同之間的「正關連度」隨著時間推移而增加，當中 2013 年上半年相關系數便達到 0.51 的歷史新高，可以說在那個時段的香港市民，已把認同自己為「中國人」和「信任」中央政府視為近乎相同的含義。但與此同時，我們目前沒有資料明確知道市民對「中國人」身份認同和對中央政府的信任的因果關係，需要日後進一步的探索。

#### 四、總結及建議

香港在回歸之前一直被視為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過去不少社會評論往往強調香港人的地方身份認同向來都不強烈，只是因為回歸後的連串政治事件才令香港的「地方主義」冒起，並日漸抗拒「國家」這個身份。然而透過上述分析，香港人自回歸之初起已相當程度在同一時間認定了自己「地方」及「國家」兩種身份，這充份反映出兩點：其一、香港人的「地方」身份認同度自回歸之初起至今都無大的改變，故此因為香港近年發生的連串政治事件而得出香港「地方主義抬頭」的結論，這顯然與事實有出入；其二、「地方」與「國家」身份認同並非「零和關係」，「地方」認同並無削弱「國家」的認同度，在 2008 年之前兩者甚至是正相關的，即「地方」認同在某程度上來說反會增強「國家」認同。但無可置疑的是，香港人對「國家」的身份認同自 2008 年起減弱了，當中又以年輕人的情況相對比較嚴重，我們相信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年輕人對中央政府的信任度也是相對較低。

---

<sup>6</sup> 我們也曾把其他因素（例如年齡、階級或生活狀況等）作為變量測試其對國家認同的影響，結果發現其關連度相當小或者並不顯著，詳細可參看 H. Christoph Steinhardt, Linda Chelan Li & Yihong Jiang (2017), 'The Identity Shift in Hong Kong since 1997: Measurement and Explan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https://doi.org/10.1080/10670564.2018.1389030>.

但值得各方反思的是，其實由 1999 年至 2008 年間香港人對於「國家」身份的認同是穩步上揚的，當時是甚麼原因令香港人如此信任中央，繼而再進一步地認同「國家」這個身份呢？我們並沒有相關的數據可以完整梳理出香港人對中央政府信任程度改變的原因，但從香港的政治狀況發展分析可見，香港人非常看重中央政府以及香港政府如何貫徹始終地落實「一國兩制」。事實上，當年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也一再重申，「一國兩制」的生命力正正源自於一國之下能夠容下兩種制度，基本法因而也確立了在顧及國家利益的同時要尊重香港的「另一種制度」。

香港是一個中西交匯、各種意見價值觀紛陳的多元化社會，因此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在制訂政策時宜展現出更大的胸襟來聆聽不同聲音，這將令政府的政策在制訂過程中採用更多有用的資訊，也可令政策在推行時減少不必要的阻撓。包容多元化的價值觀不僅是香港等大城市促進有效治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亦是 2017 年中央政府在十九大確立的「發展現代治理體系」的戰略目標。由此在香港落實好多元化的治理體系，不但可以令香港帶來直接好處，其經驗也可以輻射至全國，成為中央在全國範圍建立現代化治理體系的最佳示範。

我們明白，對任何一方來說建立信任都需要耐心和時間，在這個過程中各方都應該致力避免過激或挑釁的行為。香港政府也應調整施政的重點，著力解決大眾在民生上的燃眉之急，改善普羅大眾惡劣的居住環境、縮窄貧富懸殊、推進可持續的發展策略，為青年人向上流動創造更好的機會，畢竟改善社會經濟福利民生是所有社會治理的「麵包和牛油」，也許並非充分條件但卻不可或缺。我們相信香港特區政府已經開始朝這個方向前進，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持之以恆，而不被政治爭議而左右方向。

總結來說，我們透過重新剖析港大民研計劃的數字，從超越零和的視角為香港的「地方」及「國家」身份認同提供了新的認識，這對各方處理身份認同爭議及制訂公共政策具有重要的意義。當我們面對及處理「身份認同」這個問題時，我們不應把「國家」身份認同與「地方」身份認同放在一個對立位置，重心應放在處理「國民」身份認同度下滑而不是去攻擊港人對香港這個家的強烈歸屬感。以上是我們對身份認同的初步探索及我們如何應對的一些建議，歡迎各方給予意見並一起討論。